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七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〇期 ——  
(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4c)

---

【史海钩沉】	“文革”手抄本——割舌废言年代的纪念物	周 勃
【口述历史】	恐惧——自由的昏厥	周 勃
【拒绝遗忘】	人民日报老记者穿越文革禁区	叶小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文革”手抄本——割舌废言年代的纪念物

• 周 勃 •

文化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的主要工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会全然压制社会多元的内在发展，而无可避免地社会的文化是第一样被压制的东西；……这个国家今天阉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识性和道德会变的怎样无能？……生命的升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不断把秘密的东西开辟出来。

——哈维尔《给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

“‘文革’手抄本”这个已经被极善于“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忘记”的国人淡忘已久的词汇，随着《一只绣花鞋》一书的畅销（盗版加正版图书的印数不下100多万册），再加上由《梅花党》和《绿色尸体》的手抄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最高达到40%（当年最火的《还珠格格III》才平均28%）的收视率，特别是传媒上关于被斥之为“思想毒草”、“文革第一淫书”的性爱小说《少女之心》由出版再到胎死腹中的喧嚣（此书的出版人和内容都是笔者熟知的，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一本写该书成书过程和作者经历的非常有史料价值的书，在合法出版并已经印好后，仅因为用了这个敏感的书名，就被职能部门在没见到样书的情况下兴师动众的全部打成纸浆销毁了（更可怕的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名流，还隔山望见兔

式的将此书定义为“把政治敏感当作‘春药’叫卖的商业行为的赤裸裸的营利动机”，更可笑的是还吧这本生来就有原罪的书和马克思关于利润与上绞架的名言栓在了一块。难道他们已高雅的都不知道街头随时随地三、五块钱就可买一张要多黄就有多黄的盗版光盘，且不说互联网上随手就能免费下载的各种有色物什！只可惜出版者白白损失了数十万块的投资而投诉无门。）足见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此是如何的紧张与敏感了。使得“‘文革’手抄本”一时间炙手可热，其实手抄本不但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到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被称为今日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与伦理文化基石的《圣经》，也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

仅“文革”说文解字的字面意义便有了些许的意思：首先是加在革命前面作定语的“文化”一词，其在当时的外延和内涵指设的含混与驳杂是显见的；其次，革命所后缀的修饰词“大”字的霸道与乖戾，最终显现在中国那段特殊历史上的轨迹就是：它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基础所支撑的反文化运动，目的是革古今中外所有文化的命（语录、文选类除外），其表现形式与社会文化心态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杂交。文化与知识堕为招灾引祸的渊藪与精神奴役的引信已成为必然！

正如F·荷尔德林所言：那些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文革”之于中国文化，若仅仅是几年内全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答疑解惑的学校（纵观中国历史，即使战乱贫困或血腥残暴到极致的年代，教育之薪火相传从未断种）、中小学用大放羊式的学工学农来替代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和大学从没有正式招生（所谓凭一手老茧或“白卷英雄”上的“工农兵大学”例外）也就罢了，可那几桩著名的仅凭写了几行直面现实的文字就被活生生的剪舌割肾且被施虐的对象还均是纤弱的女性的恶例，已远远地超过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式对知识人的恐吓与定义！学生用带粗大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自己的老师！一册册世代流传的珍贵书籍在狂颠与烈焰中化为灰烬……这真可谓“史无前例”！每每思及这股超过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血腥味就让我颤栗。

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公民，仅能接受布道般虔诚地观看八部样板戏（儿时乡间一个戏迷，晚间看罢草台班子的《红色娘子军》，一时戏瘾大发，改戏词吼了一嗓子秦腔：打不死的吴琼花，日不死的娃他妈！就被判了8年徒刑！）和一个作家大标语式的粗暴文字！就连此前早已被西方社会公认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报业，在报纸大样出来后，还要请木匠专门制作一张小桌子，桌面改换成透明玻璃，里面装上电灯，再把一、二版大样重迭起来对着灯光看两版间“打倒”和“伟大”之类的字眼是否会重迭，并将这种“透明看报法”美其名曰“探照”！若出现重迭，便不惜成本地将所有印好的报纸统统收回，打成纸浆。仅此，即使用蹂躏和阉割来定位“文革”对每个国人的精神烙痕，也只能勉强地透过历史的尘埃望其项背！而“文革”却是“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私人的空间和民间语境，知识人和文化的表现空间和表现状况完全陷入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对精神文化创造和享受的需求，人压抑既久，便要有所释放，正如谣谚所云：鸡不撒尿，自有它的去处”。“文革”手抄本便产生在压抑黑暗的文化霸权的阴霾之中，故其繁茂滋长的过程自然与我那几根生长在燎泡中的胡须相类似，都是长在疮疤上带菌的枝杆，总会受到其时代进展和社会变化的影响。

词汇是有历史的，每个词除了它的词源意义和字典解释外，还包含着这个词产生时的境况、原因等多种信息符号。可我遍查《现代汉语词典》、《英汉词典》等权威工具书，都没有收录“‘文革’手抄本”一词，故我定义“‘文革’手抄本”的注释应为：民间文学是“文革”手抄本的母体的，而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倍受精神奴役和蹂躏的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空白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由某人匿名写作，再由相信该故事的真实性并喜好它的阅读者抄写传阅，抄写过程中传抄者不断根据自己的好恶加工或改变，写作语言接近口语化，叙述

方式类似传统话本中的故事，具有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同时还具有集体创作所特有的文字粗糙、故事性强且紧贴时代的特征，属民间传说现代版的延续。故事内容多以满足当时人们心理需求、审美情趣和以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蓝本。是“文革”中后期过剩的激情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虚幻游离空气相悖逆的产物，其中不乏道德法庭、道德救赎、潜越禁锢式的进步作品，但大批判、肃煞、颠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语境、神经质的图解阶级斗争观、空洞浮夸等大标语式的信息符号仍是手抄本的主流。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为主体的。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和中国的反特和地下斗争题材的电影、小说是其创作的基本模式化的叙事结构。随着时间渐进，相信故事真实性的读者也越来越少。

但其创作者不甘“自觉贱民”的卑微和超越文字剪舌的危险，表达其个体的思维，抵抗文化专制，冲破文化禁锢和冒险争取自由出版（传抄）的勇气和非功利创作的民间性确乎极具进步意义。当时的手抄本大约有数百个版本，其中以《第二次握手》曾名（《浪花》、《归来》等）、《梅花党》、《少女之心》、《绿色尸体》、《别墅魔影》、《第100张美人皮》、《红都女皇》等流传最广，几乎传遍全国各地城乡。而手抄即流传的方式，有别印刷体，而本字并非书本的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其传播的载体：日记本或工作手册之类的纸制品，因为这些当时用来传抄的各种本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物。

“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是“文革”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活化石，是重修或完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它在极端文化专制的危境中开辟了全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其独特的创作流播过程和顽强的表达意识，都使其赋予浓厚激越的悲剧美学色彩，但它作为双刃剑的另一极——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严重带菌者的身份也不容忽视！

手抄本之于中国当代精神生活流变史和个人记忆的撞击与烙印，无异于填鸭式渗入民族记忆之中的选集、语录之类的文字，其影响几乎浸淫了那一代人整个精神和心智的成长期，那种公式化的叙事和粗暴的霸权话语，甚或影响他们一生且延及后世。

研究“‘文革’手抄本”就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传播（出版）过程和渠道，这点有着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但只要折回它的原点打捞出其创作、传播者当年的痕迹，亦不难梳理出些根根梢梢：毛泽东在1966年初突然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及八次接见“红卫兵”，遂将狂热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弄得血脉贲张，满世界的“砸烂”、“横扫”，待到“停产闹革命”，武斗等弄得城市失业人口超过了临界点，而几乎所有的不与毛保持一致或略有迟疑的“走资派们”也都被“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时，而那些造反造的刹不住闸的“小闯将”们又开始寻找新的造反目标时，伟大领袖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立马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激情的瞬间冷凝，再加上理想与现实的绝对距离，在他们的精神领域里出现了可怕的空白和盲点，怀疑、无所事事、大量散漫无聊的空闲时间，于是各种类似当年地下党传递情报方式的传抄手抄本便开始流行，而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个山呼几年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林彪从飞机上掉到外蒙古的国土上，几年单调枯燥的再教育生活和受骗后的沮丧感就象温都尔汗土地上飞机残骸发出的熊熊大火一样，手抄本也在知青部落里星火燎原！而由毛泽东亲笔批示的全党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罪证之一、由林立果炮制的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一些对毛的指控性文字却意外地成为当时的各种思想之火的固体燃料。

据传，在“文革”中全国流传的手抄本有100种左右不同的版本，而目前能见到的不超过40种（本），仅就我所见到的版本中从内容和政治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可分为四大类，一、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二、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三、浮浅媚俗的“精神拾垃圾者”类；四、打破底层清教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

篇》类。

首先，分析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手抄本的萌生、发展、背景及主要作品。那个先后被称作“亲密战友、永远健康、阴谋家、野心家”先扬后抑的从伟大统帅到卖国贼“林秃子”的林彪在异国他乡的“自我爆炸”，对广大“红卫兵”小将（无论是当时的知青还是青工）和全体国民的神经都是一个空前的撞击，而在广阔天地“练一颗红心，两手老茧”的知青们在几年现实生活的打磨下“红心”已由热转冷，再由颓废到怀疑，林彪事件让这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彻底清醒，他们迅速从统一严密的时代主题的黑幕下撤出自己个人的独立性思维，在那个言词可以使人坐牢或杀头的年月（因为一种言论就具有可能动摇整个制度和政权的能力，故极权的掌握者对可能的言论者之手段就可想而知了），冒险地试图重建民族灵魂向导的地位，暗地里进行着老鼠抠猫屁股的危险游戏——在因“红太阳”著名的浏阳河发源地大围山插队的张扬，其后来发行了430万册的《第二次握手》，已以《归来》的题名“流毒”全国。而在北国保定附近以抗战中雁翎队而闻名的白洋淀，一批被发配到此间“接受再教育”的北京知青，犹如被逐出家门的犹太人对家邦的渴求一样的他们，不堪忍受文化与精神的极度贫乏，从借书换书，发展到“地下诗人群”。而由之衍生的《今天》杂志和朦胧诗人群成为名扬世界的汉学杂志和文学团体，他们作品的流传当初都是以手抄即用笔记的方式抄写在本子上的。当然，还有为数不菲的思想者也曾养成于斯，故而后来与之相关联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那面因贴满文字而变得著名的墙等在精神的血脉里都流着与之难以割裂的脐血！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之所以获罪并且使得作者险些丧失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他的作品在一个否定常识和个性需求的年代讲出了常识和个人诉求，这足以证明那是一段多么极端专制和恐惧的年月：一个人因讲出真理而被杀头或象古奥达诺那样为宣传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而被割掉舌头、绑上火刑柱的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可怕（当然这是中世纪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恐怖的一页），因为他讲出的“日心说”是超前的科学真理！而相对讲出了常人的基本诉求，比如：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我要读书等就要付出身家性命的年代的百姓其不幸与无处不在的内心恐惧就可想而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正是讲出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

较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白洋淀的思考者群落被社会普遍认知的程度则要宽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的优势和主体所操持的诗歌这个短小精悍更适合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的文本，加之他们其中多数人后来又侧身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故优先说话的权利和表达机会象红罂粟一样铺满了他们脚下那条流播之路，而至今作为海外唯一用美元付酬的汉语文学刊物《今天》更是他们扬名海内外的荣誉之舟。而我认为，在他们之中，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芒克的组诗《十月的献诗》和顾城在他的《独犯戒律》中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则是这艘荣誉之舟吸引广大受众眼光的亮丽白帆。

另外一个值得在此提及的手抄本，就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根据叶群在全国范围内为儿子林立果选“妃子”，给女儿林立衡招“驸马”的真实事件演义的两个不畏权暴、勇敢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在林家为爱殉情的爱情悲剧，这个手抄本在被称作“四人帮”的三男一女的模拟像被吊到北京街头的树枝上不久，便被分别以《别墅魔影》（青海人民出版社，著者袁民权）和《大海作证》、《星星作证》（群众出版社）之名目写成中短篇小说公开出版，也算给那个倒春寒的料峭季节续了把尚有些许温存的薪火之灰烬！这个手抄本其积极意义在于：正面大胆地在那个禁欲年代（特别是高层将控制个人欲念当作钳制人们思维的一种手段），提出了爱情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并且极力宣扬爱情的纯洁与高贵这两种属性，在那个为了招工进城或参军上工农兵大学，男的宁愿娶村支书的傻女儿，女的甘愿让肌肤与手指一样粗糙且年龄能当自己父亲的农村掌权者肆意喧淫的年月，一对璧人儿为了爱情竟敢公然拒绝进入当时中国的第二家庭作

其成员，最终以双双殉情为结束，虽然故事的套路与铺排透着中国传统戏剧和话本中才子佳人的底色，故事中也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极强的时代价值观：诸如过分强调处女膜的贞烈观、愚忠等封建意识，但其对爱情的专著与执着，却是贴在那个人性和人情都千疤百孔的年月上的一剂上好的膏药！

同时为了《南京知青之歌》已被当时的权贵张春桥点名、差点被判死刑，并后改判10年徒刑的词作者任毅及其相关的《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当时的流行歌曲，也当属此列、具其功效！因为仅从《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就能反映那个年代的情感真实：《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 美丽的扬子江畔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 啊 /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 / 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 /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加载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 / 啊 /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 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 赤遍宇宙 / 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 我的家乡 /

而在这一类型的手抄本之中，当时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同时在党内斗争，特别是争取并引导民众的支持方面起到不少作用的当属1974年开始由南中国广州逐渐向北方传抄的手抄本《红都女皇》，而其创作及流播过程，至今仍是一桩公案：据2002年1月号的《党史博览》杂志刊载的《钓鱼台内外的江青》一文中以小标题为“江青给自己树碑立传，约美国女作家长谈，泄露了大量党内机密”中透露，江青借机私自与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等地密谈6次之多，共谈了60多个小时，让其为自己树碑立传，维特克事后根据自己的纪录，写了一本书《江青同志》，也就是流传甚广的《红都女皇》，中共中央不得不派出外交人员重金买下该书版权。毛泽东看完该书，做了“孤陋寡闻，愚笨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的指示。这段文字言之确凿，有声有色，手抄本《红都女皇》公案似乎铁案如山了。其实不然，在“文革”强弩之末流传全国的手抄本《红都女皇》其实和维特克毫无瓜葛，就连好多当年的当事人指证的是由香港某人写的也是一种误传，因为笔者将手头收集到的《红都女皇》手抄本和1970年代中后期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一书做了比较，无论从叙述文字和内容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其二者的共同之处确都是揭露和丑化江青。而这一时期，正好是邓小平出面主持全面工作且“四人帮”的权力受到限制的那个短暂的政治小阳春。可这个手抄本，无疑为后来粉碎（我一直为这个特指的词汇玩味）“四人帮”在普通公众中既定了特指的量刑基础：诸如“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式崇洋媚外的卖国品质、泄露国家机密的现行罪状、激怒毛泽东（当时“接班人”所必须得其首肯的正统者）并要与其分道扬镳的叛逆……无论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之在当时的权力斗争中被对方致于死地的。尽管江青是一个极其不值一晒的小丑，但《红都女皇》这个手抄本在对普通民众对江青的感性认知中，仍起到了漫画式的丑化与勾勒作用。

其次，对于“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手抄本的分析，着重点则是对其“民间性”的探究与梳理：此种类型的手抄本，依手头仅有的篇目按其流传及影响当首推《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在其流传过程中还曾变异为《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另外还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等为数不菲的篇目。其内容主要是将高层政治斗争以盲人摸象的平民视角演义成为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民间故事，而其故事的易流传性又加速了故事所编排的事件（和当时高层对所涉冤假错案定性一致，且肆意夸大）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近而为信息来源相对单一的民间社会提供了对高层政治斗争结果认同的潜质素材，给民众记忆的程序中输入了难以更改的病毒（比如刘少奇、王光美平反多年，而每当问及那个时代过来的普通民众，对这两人下意识的直感仍是“叛徒”、“特务”），其文本意义和现实中的“积极配合形势”、“图解政策”有异工（甚至是同工）同曲之效！前文所提及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一书中对“传说”特点的定位——“在于有人相信”则更是明证。下面逐一解读辨析此类型中几个典型故事的衍变与“密码”。

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及其在传抄过程中流传变异所孳生的几个子本，其内容无论放在“文革”还是在现在，都是绝对的“爆料”：潜伏在中国大陆的“梅花党”党魁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而国民党逃离大陆前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则是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梅花党”海外联络员。利用196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新闻焦点——李宗仁由美归国的真实事件作壳，引出郭德洁奉命于美中央情报局或台湾军统局趁李归国之机与国内潜伏的“梅花党”党魁联络、李宗仁和郭德洁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王光美按联络暗号如约拥抱郭德洁（历史事实是李、郭归来，王光美很有可能随夫去机场迎接李宗仁这个统战对象，再则以王光美年青时所受之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也有可能与郭德洁用西方礼仪拥抱，当时的媒体可能也作过相关报道，故用此细节去印证这个编排拙劣，叙事鲁莽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用民间话语诠释主流政治形态，巩固民众的政治迷信则是再恰当不过了。同时也更容易通过小道消息的渠道，用欲说还罢，半遮半掩的方式，散播高层秘密政治斗争的荒谬逻辑），郭德洁内心震惊，很难相信堂堂国家主席夫人，就是自己要找的接头人，故不敢继续使用接头暗号，而王光美接头心切，在欢迎晚宴上又频频与郭德洁碰杯（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接头暗号），郭德洁仍不敢冒然接头。后来周总理安排李宗仁夫妇去全国各地参观视察，郭在参观过程中，看到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文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内心涌起波澜，准备跳出特务组织的苦海，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王光美发现了她的意图，竟趁再次设宴时给郭酒杯中下了一种能使她旧病迸发而不知名字的药，郭情知上当，临死在上海前恳求见毛主席一面，当周总理匆匆赶到郭的病床前，代表主席探望她时，郭非常感动就在病床前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原原本本面告总理，随后放心地死去——此处的这个“死”字用得更加阴毒，因为郭德洁按历史的真实就是回国不久而病死大陆，李宗仁后娶小自己近二十岁的年轻夫人的事情在那个由于情感空白而引发窥隐与好奇心的特殊年代又使得民众尽人皆知，而硬将一段信史和另一段编造的荒诞透顶的民间传奇揉合嫁接在一起，用民间叙事原则利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使民间思维和高层残酷隐密的政治杀戮达成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进而对刘少奇的残酷折磨与非人虐待，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王光美——一国元首夫人的人格羞辱和肉体“触击”甚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彪语）。从道义和民意上都显得顺“理”成章了！故无论如何，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为迫害刘少奇夫妇在民间社会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暗示上都起到了无可辩驳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故事结尾处，关于王光美被捕的时间、地点和过程，则是竭力迎合刘少奇被迫害这一政治事件当时的官方口径并于以“克隆”：1967年3月30日，由曾在解放前利用“男色”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后在停尸房装死人、一直参与此案侦破的南京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员的单位是相对偏远的南京市而并非北京的公安部，且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安侦察员，这种编排完全适合民间传说中老百姓所希冀的结局——弱者战胜强敌，小人物搬倒巨奸的民间想当然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期盼）张强，设计将王光美骗到公园（即“文革”词汇中所谓的“光天化日下”的能指物），用一条大毛巾塞住其口（剪断张志新喉管，用针线缝住史云峰嘴角等封杀不同声音传播管道的残暴），几只粗壮（多数群体的独断与强暴——即多数暴政，无怪《犹太法典》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凡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没有人提出异议的决定，都属无效。”）的大手轻易将其抓获；手抄本中的这段叙述与现实王光美由当众批斗到逮捕再到林彪批示：“立即执行死刑”的时间脉络完全一致，其落井下石和强性盖棺定论的功效不言而喻。但就其整体所显现的丰富且复杂的信息符号，作为后世研究“文革学”，仍不失其标本和化石之功能。

而后来陆续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几起遍布全国各地的利用“梅花党”搞经济诈骗或刑事犯罪的案件，特别是1998年发生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的那桩离奇案件：即全国劳模、西安五棉集团董事长、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应治帮，这个曾在全国纺织业界声名显赫一时的官场人物，竟然相信了一个编造的极其荒唐的“梅花党”故事，用数十万公款为骗子们做了一个馅大肉肥的打狗用的包子，真不知道此君是贪污的缺口过大，想钱想疯了，还是其当官过程中僵化的官

样文章作多了把脑子给弄坏了？但仅此足以印证《梅花党》在那个时代人们潜意识中的根基！

而最让笔者感到卑劣与荒谬的则是“文革”之后，出于政治附合式的投机和商业利益而沿用“文革”思维对《梅花党》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的篡改（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词语，我虽深恶“文革”近而厌屋及乌——对“文革”及其衍生的词汇，行文时尽量避免使用。但一则因接受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其毒素已深楔我辈之血脉，二则此处用之实觉较为贴切准确），使之由“文革”版的恶意能指的小道消息式的民间政治谣言的传声筒变异为歌功颂德式的所谓善的谎言。

首次“篡改”是在中美建交（当时笔者正在上整日放羊式学工学农劳动的所谓小学，学校大喇叭——那段年月全国各地权力的符号，传出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云云，一时间几百人的一所学校竟不知美利坚合众国为何物，最后竟是一位因出身不好而下放到此的老语文教师战战兢兢地说：可能是指美国，不！是指美帝。当随后接到上级统一口径的文件：我们已和美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友谊，不要再用美帝一词了，我们才明白了美帝并不是美国的名称！）之后的70年代初期，《梅花党》的故事又以《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之名开始流播，其故事是讲因水门丑闻下台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宴席间服务员不小心给总统夫人心爱之物、也就是当年总统与之的定情之物白纱巾（典型的当皇上的人每顿都有肉吃的思维模式，因为纱巾、的确良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消费观念里布料中的奢侈品）上滴了些油渍，老工人或者什么心灵手巧之人不辞辛苦在这条纱巾的油渍处绣上36朵或50朵梅花巧妙地遮掩了油渍的印痕，无论编造者是附会“梅”美谐音，还是以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数字的诠释六六大顺套用36或者50朵梅花代表着与美国50个州人民的友谊什么的，但我都要说：这些人为了变种的所谓梅朵，无论从字典意义还是符号能指上讲，都不能算是花，若硬要将其往花上贴的话，也应给其加上前缀词，露天茅坑（决不是现代都市施用的较为清洁的厕所）边上生长着的一株粘满细菌的狗尾巴花！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种族今后的繁衍与心理深层的修复过程中，根绝“隔山望见兔”式的思维逻辑和思维定势以及一直由之左右着的群盲从众意识是尤为重要的重中之重。

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如果其中一人偶然吃出了一只苍蝇，教养好的那种食客或是偷偷将其扔掉或事后叫出老板善意暗示；而另一种要不一口将其吞下肚去省得恶心大家，要不就一口吐在餐桌上让大家看个明白、吃个清楚，我的处世为人更趋于后者。故对最近在媒体上仍有余温的那只被炒焦了的《一只绣花鞋》，我若一口吞下去倒不是因嘴太小，而确实是它太臭了且包了一层极具诱惑色彩的乳液近而成为一颗“糖衣炮弹”，我不得不依着秉性将忍着恶心与呕吐化去它的外壳而露出的本象吐在餐桌上，让大家一次看个够。

尽管《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的版本中，王光美、郭德洁等主要人物已被做了金庸武侠人物式的“乾坤大挪移”，故事情节也编造成了驴头马嘴，可其间仍依稀残留着些许“文革”标本的影子，而最近一次搭底苦面式的旧瓶装新酒（用这个赝品年代充满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与劣质工业酒精勾兑）后公开出版，封面上堂堂皇皇地印着×××著，报纸上充斥版面的专访大照片，再加上一段乱哄哄的著作权或名誉权的笔墨官司穿插其间，使得一桩原本就荒唐无聊的事由逐渐演变成一出可用卑劣下流来作前辍词的荒诞闹剧——因为明明白白的是看在钱的脸上的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我素来不排斥快餐文化，因为在商业社会里，它是发掘新经济增长点的可能——好莱坞的一部《泰坦尼克号》的票房超过了国际上三家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一年收益的总和！），但罩着“文革”手抄本温情（由那一代失落的中年人怀旧心理作祟而发酵的变味情绪）的面纱，旨在从他们因下岗或上有老下有小而几近干瘪的腰包里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做个幌子割上温柔的一刀。在日前这个喧嚣且急功近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出版业界，确乎不算什么，但要害是其作者（？）将一个那个年月任人尽知的为迫害国家主席张目的粗糙民间故事，改写成讲述我公安人员如何与图谋打入我们内部窃取情报的敌特斗智斗勇的侦破歌颂

小说，而且言之凿凿地断言“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文革’期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一只绣花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关于梅花党流传的手抄本有十几种版本，但他写的版本是当时比较积极、健康、完整、文学性较强的一种版本，这个版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加载中国文学史，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也不能例外。”这段引言，便是出自那位专为少男少女写诸如花草猫狗、情情爱爱之类流行歌词式的流俗诗人汪国真为《一只绣花鞋》一书所写的序言，且不去深究这种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背后是否有“一顶轿子，哥们几个，轮着抬轮着坐”式的道德失禁后的自慰倾向（因为文明社会，个人行为只要不妨碍他人利益，尽可纵情发挥），单就这段不算太长的文字中忽儿“异草”，忽儿“民间口头文学”忽儿又《三国演义》，再加上“保持原始的面貌、加载中国文学史”等拉郎配式的穿凿附会，就显现出了其眼花缭乱之下的力不从心与鼻孔插葱硬充大象的世故与琐屑。

既然扯的是“文革”手抄本的旗子，那么就不应该用自己造的假酒来误导后来者的味觉或让曾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当事人的记忆在温情的怀旧氛围中变得迷迷糊糊是而非！因为这一整理或者曰创作，矫情地变异为歌颂公安类的正面肯定。其隐患便是在制造人们记忆混乱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局部或个例的肯定与谄媚！

至于序者将其与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名著硬往一块掺合，还有作者在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中的：“口头文学、手抄文学，其实就像今天的网络”以及因序言中一句《雾都茫茫》电影取材于斯而引发的热闹笔墨官司，我只能说闲着也是闲着，哥几个三忽悠两忽悠的保不齐还能捧出个文坛新品种——手抄本的鼻祖或者老佛爷什么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常识，因为深恶由文字构陷的险恶（特别是刘震云先生“一地鸡毛”式的单位为蝇头小利借文章撕咬、说事儿），故暂且把该“创作”对故事彻头彻尾的颠覆或自许原故事的原创者的事由放下不谈，仅就炒作过程中的形态，就让人不知所云：一个现代人，若用粗疏的文字将历史上著名的《白蛇传》或《孟姜女》再“创作”一番，然后再以这些著名传说的原名为书名，封面冠以×××著，你会作何感想？！我只能套用我那荒僻乡间的一句俚语的前半部分“光屁股撵狼，胆大不要……”作答了。

此类手抄本的主要共同点便是用隔山望兔式的思维方式，以捕风捉影的叙述方法将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利用传奇故事的套路，生硬地同官方的口径牵强附会，进而助长“庄稼猴，一个挠头都挠头”的盲从随众心理。要根除这一人格养成的隐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和我们所承启的中庸圆通的传统文化中去反省与剔除。

而就“精神拾垃圾者”类的手抄本讨论起来倒颇为轻松有趣，我们还是就手头所能掌握的资料先罗列一下此类手抄本所涉猎篇目的名录，依次为：《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和《一个绣花枕头》等，从其名目，就不难看出其内容所包含的丰富的娱乐性与充满爆炸意味耸人听闻的猎奇性信息，其属性与归类也较接近80年代初从港台传入、尚属初级阶段的恐怖鬼片和民间文学的又一个分枝新故事（其实后来在全国新故事大赛中获奖的不少篇目，其内容、情节和叙述方法都能从这类手抄本中找到影子），而目前人们所常讲的可视性与商业性，在这些手抄本中也体现得较为充分，更为可取的是，这类手抄本在铺排叙述中基本上脱离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成为民众填充当时由“一个作家八部戏”构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外文化娱乐生活空白的精神补充物，并为80年代



新故事的崛起和之后中国通俗文艺的发展作了粗略的土壤优化！

这类手抄本中也可依原创者编排时的心理和故事内容分为两大类，即：远离故土避祸类与惩恶扬善式的现代公案类。前者的主要篇目有《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和《金三角的秘密》等，这几个手抄本的共同点则是故事发生地和主人翁全都是在外国和外国人，手抄本的始作俑者文化素质较之同代人稍高，且在“文革”前受到外国、特别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侦探小说的影响，对西方的社会状态与习俗也略有了解。而后者的题材范围主要是虚构建国初的反敌特案，主要篇目有：《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一块手表》、《三条命案》、《远东之花》、《三下江南》等，案发地多为重庆、上海、南京等，所叙故事与高层政治斗争关联不多，故而同前者一样，其始作俑者们到颇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必备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卫心理。比如：前者的故事发生地选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里，主人翁又都是外国人，后者则是简单的好人打击特定且不会随着政治运动而改变性质的坏人，及国民党所暗藏的敌、特、反之类。故而即使案子写得再残酷，场景描述再恐怖，那也是往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上抹黑！这非常适合“破鼓（提前预设与有罪推断）众人捶”的中国式思维逻辑。

因为这一类型手抄本的始作俑者内心因文招祸的恐惧与忧虑减少了些，加之其出现的年代大都在1975年，即对“文革”的怀疑怨恨情绪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偷听“敌台”（主要是指“莫斯科之声电台”、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英国的“BBC电台”等）也是当时“知青”和城里的青工们人所尽知的秘密，僵化禁锢的社会形态逐渐松动，故这一时期的手抄本相对前期的手抄本在故事情节上要精彩得多。若是哪位有心的影视导演在这类手抄本中作番纸上考古，相信无论是收视率还是情节的巧妙复杂上都不失为一段含金量颇高的富矿层。

关于第四类也就是打破底层清教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类”，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目前对这一类型的手抄本无论是整理出版还是个案研究尚属禁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坏书”毒害并引诱为数不菲的青少年走上了犯罪道路，若要为此观点找寻事实论据，则随便翻开手头由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相关资料和个案俯首皆拾、枚不胜举：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的吴效堤、丁冲在题目为《关于我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调查了解，手抄本《少女之心》危害极大，少女×××因有人和她说了几次《少女之心》的故事，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也提到了《少女之心》——有个名叫贾××，别名“黑玛丽”的女青年，今年20岁，高中文化程度，该贾在上中学时，偶尔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体味其中的下流描写，并不时以手淫来满足需求。整日昏昏沉沉，不思饮食，开始寻找男流氓。1979年9月，该贾到男青年李××家玩，喝酒、吃饭，晚上住在其家，半夜该贾走出屋门，叫醒李××，非让李与其同睡，并说：“我看过《少女之心》，与男人性交是件舒服的事”，并主动脱掉衣裤与其发生关系。从1979年以来，她先后同男流氓韩××、丛××、孙××等十五个人发生两性关系。有许多情节是极其下流和令人作呕的……；而手头的另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要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军事法庭执行了死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则是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发在《南方周末》（2001、2、1）上的《书架上的战争》中的个案——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

把刀子捅进了亲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上开了公审大会。……

如上所列举的这些个案，均出自法学专家和知名学人的手笔而并非坊间舛讹之言，其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似乎可以铁板定案了——《少女之心》之类的手抄本是十恶不赦的坏书，是引诱青少年性犯罪的根源与祸首。但我仍想说声：且慢。由于笔者也看过不少不同版本的相关手抄本，虽然这类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绝少目前“美女作家”或“纯文学”作家们尽性的感官与性心理的病态描写，而其淫秽程度比起眼下街头几块钱一张随手可得的“毛片”，那简直就是低幼读物，可现在的性犯罪案件却大大的少于那个年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性犯罪的概率与社会开放程度成反比例，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被法学专家们屡屡引作论点的8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个案本像所露出的端倪：其出处多为审讯口供或监狱人犯的“认罪”材料，而在此对监狱可借用曾为《南京知青之歌》案坐过近10年牢的词作者任毅的一段总结“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对监狱的特性作以注释，而如此真凭实感却正是法学专家们所阙如的。

因之，笔者以为：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叙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贱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而他们之间被新老犯人口口相传成为共识与信条的则是：“坦白从宽，劳改场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此点极像成克杰、胡长青之流的腐败分子，一旦案发，就长篇大论的开始“反省”，其文字一开头大都是：我放松了思想教育，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云云。至此，我突自想说：抓把牛屎抹在你的狗脸上！

如此“忏悔”听惯了倒也动听，觉得似乎还是有点真诚，其不知全是些言不由衷的屁话（简直就是腐败分子们落马后自降罪刑与衍允的流行语录）。单是将其贪婪奢靡本质所引发的犯罪事实的原因推委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够下流、够虚伪的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方式？依笔者在美国的亲眼目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爱荣誉、要体面。在家里爱太太、疼孩子，在工作或公共事务上敬业守法……请这些腐败分子的后继者们，往后犯案时有啥说啥，不要死到临头还不能将融入人格中的说谎基因剔除，更不要把自己脸上的黑灰往人家资产阶级的脸上抹了！故而，我认为此类型手抄本的负面影响因着相类似的盲点，被以讹传讹地无限夸大了（我当然不是在否定其原有的负面影响），而其积极、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却在因噎废食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盲点与禁区。因为一个僵化的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禁锢首先来自于对性的禁锢与罪感化，而要打破僵局，反其道而行之不失为“解铃与系铃”二者兼一身的方法，此点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河流中都不乏其例。

研究一种文本或者是文化现象，自然要探究其产生的土壤和民众当时对此的反应和态度，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尽可能的先为之提供一个最接近原生态的参照物，而对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地修补与编造，都会使其研究走向反面，轻则误导研究者误入歧区，重则有可能改变民众的记忆近而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潜层种下灾祸的“遗患”而影响到民族的未来！狗只所以屡屡地挨砖头，原因就是其记吃不记打的秉性！那么作为灵长类高智能动物的人呢？！

有鉴于此，我只得在保留手抄本的原始性上呼吁几句，而要将精力集中到收集“文革”手抄本的巨大工程上，则要靠大家的不懈努力。《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是我所知道国内第一部“文革”手抄本文本性文件的汇集，独立出版人白士弘先生的努力，将为国内有志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珍贵文本，其作用与影响，不用我多说。这并非一篇导读式的序言，因为那样只能给阅读者限定思维框架。最后，应该感谢在此书诞生过程中所有做出过努力的人们——点校者、出版者、特别是那些无私献出在恐惧与担心中珍藏手抄本多年的收

藏者……

## 参考书目

- 1、《进步与共存——萨哈罗夫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苏]萨哈罗夫着，王淑琪译）
- 2、《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奇光着）
- 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
- 4、《大屠杀后遗症》（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伦·哈斯着，梁骏等译）
- 5、《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微拉·施瓦奇着，李国英等译）
- 6、《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薛君智主编）
- 7、《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英]F. A. 哈耶克着，冯克利等译）
- 8、《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版）
- 9、《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端木玉斯选编）
- 10、《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出版公司，1988年版，[美]阿妮达·陈著，史断平、田晓菲、穆建新译）
- 11、《中国的反右运动》（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英]纳拉纳拉杨·达斯著，欣文、唐明译）
- 12、《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张杨著）
- 13、《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谢泳编）
- 14、《朱学勤文选——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朱学勤著）
- 15、《一只绣花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张宝瑞著）
- 16、《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季羨林著）
- 17、《民间文艺文学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钟敬文著）
- 18、《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上海分会编，上、中、下卷）
- 19、《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着，桂褚芳译）
- 20、《哈维尔文集》（台湾唐山出版社，1998年版，捷克·哈维尔著）
- 21、《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宝林著）
- 22、《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柳田国男著）
- 23、《中国古代奇梦集锦》（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孙博泉著）
- 24、《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陈众议著）
- 25、《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安东尼·德·雅赛著）
- 26、《海南纪实》（1989年全年）
- 27、《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一只绣花鞋》的相关报道）
- 28、《“黑框事件”及其它》（《南方周末》2000年12月21日12版吴永川著）
- 29、《书架上的战争》（《南方周末》2001年2月1日7版朱大可著）
- 30、《“梅花党”的传说及其流毒》（《南方周末》1999年6月11日10版林焱著）
- 31、《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32、《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全年）
- 33、《“文革”初期查获作品的作者一览——“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王同策著）
- 34、《一百个美女的塑像》
- 35、《绿色的尸体》
- 36、《一缕金黄色的长发》
- 37、《叶飞三下江南》
- 38、《一只绣花鞋》（只有一半）

- 3 9、《二零三号病房的秘密》
- 4 0、《地下堡垒的覆灭》
- 4 1、《三条人命案》
- 4 2、《菊花恨》
- 4 3、《悬崖的爱情》
- 4 4、《金三角的秘密》
- 4 5、《梅花党》
- 4 6、《远东之花》
- 4 7、《别墅魔影》
- 4 8、《一个绣花枕头》
- 4 9、《少女之心》
- 5 0、《红都女皇》

~~~~~

## 【口述历史】

### 恐惧——自由的昏厥

• 周 勃 •

（前言 寻找文革手抄本的收藏者，使我第一次如此真切而真实的感受了文革留给国人无处不在的恐惧后遗症。而恐惧就像一个带菌者一样，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无限蔓延，吞噬人们的生活细节、吞噬言论自由、吞噬人们的未来和精神成长、最终吞噬一切！因为从人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来讲，麻痹与懈怠是恐惧的后遗症，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征兆的威胁与灾难会使人的心理总处在非常态的恐惧与警觉状态。而这种恐惧程度越高、状态持续的时间越久，对心理的能量消耗的就越大，而其所呈现的麻痹程度也就越高，而这种麻痹正是一个常态社会的毒药！这决非危言耸听，下面请允许我用自己在文革结束已经整整30年后寻找手抄本的抄录者与收藏者的过程中所见到的感同身受的恐惧个案，来作为一个解析现实中国的活的政治标本，尽管此前他们一直不愿公开承认这种恐惧不断肢解着他们的正常生活：梦魇般持续不断的威胁、毫无隐私可言的个人私密生活、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恐怖追逐的栖无定所的狼狈与焦虑……

因为，他们几个收藏者在与我相约见面的过程，无一例外的全是老电影中特务们接头见面时场景的翻版：带上捂的严严实实的大口罩、第一次见面紧张的都有点结巴、给我转交他们珍藏的手抄本时都像扔烫手的山药一样快捷而神秘。临了还不忘叮嘱一句：这些手抄本的内容我可没看！只是当时为了练字，更没有外传……你根本难以相信，这就发生在闪烁着“麦当劳”招牌霓虹灯下、而且是在鼎沸的商业叫卖与奢靡的红男绿女接踵的北京街头的场景。)

访谈录：

◇ 尽孝心抄下了这些手抄本

访谈对象：田先生

访谈人：周勃

访谈地点：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某茶馆

访谈时间：2001年2月6日

基本情况：1963年北京化工学校毕业，分到南四环附近一家化工厂工作。在工厂工作其间抄了不少手抄本。家也在工厂附近是当地的老户，分到单位近四十年都没动过，现在是单位技术部门的科长。

问：田先生，您好，能不能谈一下您第一次接触手抄本是什么时候？

答：详细时间记不清了，大概在地震的前后吧，可能是七四年。当时我在工厂里上班，“文化大革命”也开展了好几年，那阵讲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什么的，再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封资修全给破了。所谓的“封”就是国内的一些作品，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企业的图书馆全都没有了，图书要不给垃圾一样给烧了，要不然给封了，一下子就没有东西看。“资”哪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所谓“修”就是前苏联的，像《静静的顿河》这些都不让看了，作为破四旧这些东西都给破完了。从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在当时工人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以外，就是几个样板戏。你要是看报纸，就是些社论呀什么的，和政治潮流都紧密联结。人们生活十分空虚，这就跟吃饭一样，吃得时间长了就得改改口味。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手抄本。这些故事在当时流传过程中也不是很公开的，要以这个名义给你打个反革命很容易，只要这其中有某几句话或几个字有问题，都能给你往政治上靠，所以轻易不敢乱传，只要传播都要绝对信任，而不是一般的信任，流传的范围就不太广泛。作为我呢，哥们儿兄弟比较多，再说我手头抄的多了些，主要是我父亲当时患高血压住院，我们哥几个就得轮留守病床。当时整天吵吵着地震，楼房不让住，就在外面搭了些地震棚。父亲住院时，我弟弟当时在东北的建设兵团里下乡，正赶上他工休期间，那时候家里都很穷吧，一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谁轻易也不敢请假，怕扣工资呀，只好由我弟弟白天照看我父亲，看着看着我父亲睡着了他就没事干，我就给他找了些手抄本让他没事时看，看完后再抄下来给我们哥几个看。就这样由我们哥几个姐几个轮着抄，轮着看。我们家哥仨，姐仨。这些东西当时传的都非常小心，都怕传到不可靠人的手里。有些想吃政治饭的人，会想方设法弄到手里再去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比如咱们现在仨人在这谈话，有某句话说的不当，就是事儿。现在人就不怕这些了。当时传这些的时候，要的都非常紧，生怕时间长了出问题。为什么能留下来呢，主要是不敢再往其他地方传了，心里害怕呀，因而就收起来了，可又不敢往家里放，后来就放到单位里的工作间里，那里有个更衣柜子，我上学时的一些笔记本什么的都放在里面，所以就幸存下来了。要不是那天看到了《一只绣花鞋》在北京青年报上登出来，我把这事也就忘了。如果这些东西要是放在家里面，恐怕早就没有了，后来找出来给老白时，上面落了厚厚一层尘土。

问：这些手抄本对您影响大不大？

答：对我个人来讲，记忆还是比较深的。当时咱们还算多读了几年书吧，没东西看时，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那会儿经常上夜班，大家都比较困，我就从抄的那些中挑出几段给大家讲讲，大家都爱听，我也就是从这儿来，再到那儿卖卖。当时的背景，人的生活很空虚，再说这些东西也不是太离奇，比如像《三条人命》这些，挺适合咱老百姓的口味。但只能随便给大家讲讲，不能让人看，说的到时候出了事还有个回旋余地，看了可就白纸黑字的难说清了。

问：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您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手抄本毁了？

答：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想过呀，政治上的东西挺可怕的，你要是有点问题，得查你祖宗三代，这玩意不但影响你的儿子，将来连你的孙子都影响到了。所以只要沾上点政治，那会的人们就很慎重，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惹事。但我抄的这些东西，和政治联系不太紧，主要是娱乐性的多些，万一查出来要往政治上靠还不太容易，最多说你这个人思想不太健康吧，所以我也就敢往下留。对那些思想内容不太健康的，就不敢接触，比如说当时的《少女之心》，我看到标题时就觉得没多大意思。在当时两人之间若传手抄本，双方都背上了政治包袱，所以只有亲近互相非常信任的人才能给看，我们亲哥几个之间通过一定的途径弄到手，也是赶紧抄，赶紧看，赶紧还。抄这些东西也挺有意思的，还能打发时光。

问：您还能记得起来您看到的第一个手抄本是什么？

答：第一个可能就是绿色尸体，看完后心里一震，小说还有这样写的？过去咱看到的侦破小说

都是苏联的，象什么《形形色色的案件》呀，跟国内的写法也不一样，觉得挺能提起人兴趣的，心里一高兴，就对自己说抄吧。

问：您抄的故事都有那些？

答：《绿色尸体》、《梅花党》、《一缕金黄色的长发》、《一百个美女的塑像》、《三条人命案》、《菊花恨》等。

问：在传抄《梅花党》的过程中，你信不信王光美是特务头子？

答：当时人们也只是偷偷的这么讲，不管刘少奇后来平反怎么样，人们那会儿还是信，但好坏都不敢明说，谁都怕和政治染上关系，怕找麻烦。另外，经过“文化大革命”，弄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非常低，把人的关系弄得非常淡薄了。就是夫妻之间，为了一个观点，一句话就能反目。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工现在是神经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特别讨厌！她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当时北京的工业非常落后，她爸爸先来到北京化工研究院，她妈妈没文化，就呆在家里，她爸爸当时是八级车钳工，工资相当高，那会一挣就100多，日子过得非常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妈妈就是街道办争当积极分子，揭发老伴在家大骂毛主席，大骂共产党，语言十分恶毒，说什么毛贼不死，天下大乱。咱们现在才明白，所谓毛贼就是东北的一句口头语，好象是什么大胆的毛贼什么的，可她却把这当作政治问题给汇报上去了，街道办一听这还了得，根本就不去追究毛贼指的到底是什么，就写上把这个问题反映到男的单位，单位立即给他打了个现行反革命，一打成了“现反”后工资马上从100多降到10几块的生活费，当时打反革命分子要看你有没有什么行动和动机，这两点若没有的话，就给你戴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单位管制，也不刑拘。他老婆也傻眼了，生活一下子降了下来，我那同事也就极恨她妈，而他爸马上和这个家庭断绝了关系，因为没了夫妻情份，你都能让人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说的呢。而她妈也要同她爸爸划清界线，谁又愿当反革命家属呢？我的那个女同事又调到现在的燕山石化，当时叫东方红炼油厂，一个月只有30多块钱，家里生活就十分困难，姊妹多就指着她一个人挣的那点钱过日子。没从我们厂调走那会儿，我是班长，她是我们班的一个普通工人，我有时看到她一个人发呆，偷偷掉眼泪，我问她，她就把这事儿对我说了，可说实在话我当时一点都没安慰过她，那会人与人之间都很警惕，谁也不敢流露同情什么的。因而这些手抄本根本就不敢往外流传，要是万一赶上个政治楂口，白纸黑字的那还了得？她后来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就被送到安定门外的神经病院去了。

问：就您接触的范围中，有没有人因传拉手抄本而受到处分的？

答：还没有，就我知道我周围就这一份儿，我也只是平时给大家讲讲故事。根本就不能让人知道我手头有这种东西，连我爱人还没给看过。男人爱看这些东西，女同志也不一定爱看，家里都不一定知道，只有我和我弟弟知道得最清楚。

问：当时抄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怕不怕？

答：抄的时候也不敢太公开，在医院照顾病人，大家也都不是很熟悉，小护士一般打完针放下药就走。在家里抄时我爱人顾不上看我抄什么，她要照顾孩子，我母亲不识字，父亲是火车站的装卸工，也算世代工人阶级出身了，但要不是这样一个背景，这些东西怕也留不到今天了。也挺害怕的，唯恐别人见到，一怕别人看见了要借，二怕他人知道后打小报告。这些东西抄好后就在我们家里几个人中传着看过，不敢张扬呀，只要你不说也就没人知道。

问：您当时找到这些手抄本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谁传给您的？

答：主要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经营副厂长和我能谈的来，他是北京经济学院毕业的，他们同学之间流传一些东西，因为我俩要好，他就拿给我看，但要得很紧，主要还是怕时间拖长了出事。说老实话，有些东西当时我都没顾上看，拿到医院就让我弟弟抄，这是一个渠道。另外我妹妹也找了些，她在北京展览馆工作，怎么搞来的我就知道了。

问：您能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谈一谈过去那些手抄本的价值和影响？

答：当时作为我来讲很感兴趣，因为对那些模式化、公式化的东西很反感，觉得这些东西还很有意思。我给周围人讲后他们也感到有意思，干起活来就快，干完活后又催我接着说，这就证明了当时在民间这些东西还是很有基础的。

问：您认为这些手抄本的原创者都是些什么人？

答：下放到农村或建设兵团的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他们的基础较好，还有下放干部或者教师。

◇ 我是为练字才抄手抄本的

访谈对象：梁女士

访谈人：周勃

访谈时间：2001年3月4日

访谈地点：南四环某居民小区梁女士住宅

基本情况：工人，高中文化，1978年高中毕业，上初中时抄了不少手抄本，一直在工厂工作，现在一家国有工厂上班，业余时间搞婚典摄像。

问：您好，我最近一直在与当年接触过手抄本的人进行访谈，能不能讲讲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手抄本的？

答：七几年？我也记不清了，嘿，大概是七四年或七五年吧，当时流传手抄小说。我挺羡慕别人写一手好字的，那会儿主要是抄钢笔字帖，我就是那种字抄样板戏台词。我看到手抄本，还是个故事，我这个人也爱说，觉得将来抄好后还可以给别人讲讲故事，又能练字又能给他们讲故事，当时就是这个目的。我接触的第一本就是《梅花图》，那上面有他们画的图，我当时也是没事，就按着他们的样子也画了个梅花图。

问：您接触到的第一个手抄本是谁传给您的？能想起来吗？

答：我也记不起是谁传给我的（较长时间停顿，有点回避或担忧），不是同学，好象是去谁家，谁给的。我抄的时候可能是上初中，当时流传得挺火的，一般人看了也就看了，我主要还是为了练字。我不知别人传抄不传抄，反正到了我这儿我就给抄了。

问：当时您看到的公开出版物都有些什么？

答：那我还真没在意，反正别人给什么我就看什么，那时候我挺爱看书的，像什么《连心锁》，已经找不到完整的书了，就是些没头没尾的书，书越厚越（纸质）发黄我越看。

问：您抄好后有人从您手中再转抄过没有？

答：没有。我也没有，到我这儿我再没往外流传，我想着是练字，没有往外传。

问：您所接触到的手抄本中，哪个故事给您印象最深？

答：我还是觉得《梅花图》印象最深。里面写着王光美，郭德洁、许世友等上层人物的事儿，到现在我还爱看有关上层领袖们的书。

问：你当时对《梅花图》中讲的故事信不信？

答：当时我没什么信不信，甭管里面真的假的，反正能知道里面一些事儿，我没感觉相信不相信，我觉得当时的斗争就是那么回事，也没往脑子里走。

问：什么样的心理使你把这些手抄本保存下来的？

答：抄完以后特别忙，当时也是为了练字。就没有精力给别人讲故事什么的，一直没怎么给人

看过。后来一搬家，搬到农村，地方特别潮，老鼠又多，抄的东西才毁了些，原来保存挺好的。我没想到这些东西留下来将来能有些什么用，主要还是为了练字儿，因为这些东西当时不让留传，属于禁书。我抄完以后这么多年就一直再没看过，里面所有的情节全都忘了。我这个人爱看报，那一天看《北京青年报》上登手抄本的事，好奇了一下就把这些信翻出来了。

问：其实您能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也是很珍贵的，特别是对处在“文革”那种文化娱乐贫乏的情况下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种资料。下面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您个人的经历？

答：我抄这些手抄本时正在上学，不是初三就是高一，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是在丰台一中上的学。我毕业后没下乡，后来我听说我们这一届毕业的有下乡的，可能我哥在下乡，一家里有一个下乡就能免了其他兄妹。高中毕业后我们就到我父亲的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又跟福利厂对换，我开始不愿去，嫌都是残疾人什么的不好听，但那边是正式工作，再说残疾人跟自个也没什么关系，全民正式工那会儿还挺吃香的。后来大概是89年或90年，我又调了出来，现在的单位情况也不太好，反正凑合着能发出工资。我儿子已上高中了，我爱人在开出租，过的就是老百姓普通的日子。

问：在这么多年中，比如搬家或者遇上政治运动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将这些手抄本毁掉？怎样的心理使您一直将这些东西保存到了多年？

答：我家曾经因危改往农村搬过一次家，就是你们来时刚才路过的那个地方，在那儿住了三年，那边房子特别潮、家里的被子都沤坏了。

问：您觉得这些手抄本有没有价值？

答：我把这些早都忘了，也不怎么想这些事，觉得好象跟自己没什么多大关系，我主要是练字的。当时没事总找人借这些东西看，越稀奇古怪越爱看。我当时爱在家躺在床上看，有时看着看着害怕了，就从床头一溜到床犄角里了。我当时看得很投入，很容易进入情节。那会儿也没电视什么的，记得主席逝世时，还跑到挺远的地方去看电视。那时谁家要有台电视是挺了不得的事儿，我们那个大院住了四十多户，就有一家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那时谁家就是稍微有点钱也不敢买电视，溜门撬锁的特别多。

问：当时你们同学之间有手抄本的多不多。

答：不多见，我没发现同学谁手头有手抄本，我的也没往学校拿过，根本就没想到过要给谁看。没事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讲讲故事，但是没想到拿给他们看。

问：你用什么时间抄，是上课的时候吗？

答：我是晚上回家来抄。家里人也不知我在抄什么，再说我上学时学习挺好的，所以在班里上课并不抄。当时抄的时候也没感到害怕。

问：您抄的都有那几个故事？

答：《梅花图》、《一只绣花鞋》、《303号房间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还有两本让我看看给拿走弄丢了，好像是《303号房间的秘密》和《绿色尸体》。《303号房间的秘密》是上、下集，他给弄丢了一本，可能是下集。我就给他一个人看了，从他给我弄丢了两本我就不愿给他看了，尽管他是我弟弟。当时我弄不清楚他是真弄丢了，还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了，我当时抄也挺辛苦的，根本就不愿意给别人。

◇ 在坟头上抄手抄本最容易进入情节

访谈对象：梅先生

访谈人：周勃



访谈时间：2001年3月3日

访谈地点：日坛北街雀扬春饭店二楼

基本情况：从小随父母单位上小学，1971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到沈阳军区，在部队的报社工作过。有少量作品发表，获过全国硬笔书法大奖赛优秀奖。现在一家通讯部门任职，少年喜好收藏。

问：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见到手抄本时的情形？

答：1972年到1976年7月之前，手抄本比较流行。在学校的学生中，初三至高二的学生抄的人最多。当时文学作品非常少，几乎快成了真空状态，我又从小爱听故事，再加上停课闹革命不上课，空闲时间多。记得当时在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所重点小学都是的孩子，他插队早，可是老回来，我们就去他那儿听各种故事，可也不能白听，是要上供的，我们把家里留的糖块呀、小零食呀拿去听的时候送给他，因为他比我们大呀。到我上初中时，七四年或七五年时同学们之间开始盛行传抄手抄本，我记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故事：《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再有就是写我们国家自己怎么培养间谍的，比如《远东之花》一类的，还有寻找宝藏一类的，不是传统的挖宝，而是像《金三角》一类故事，再者还有写解放初咱们的地下工作者如何打入敌人内部卧底，保护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当时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所以上课时，让学习好、写字快的同学抄笔记，放学后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给老师完事。那会儿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反正也没人认真。剩下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就一块儿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抄的时间都是利用早读、自习，还有音、体、美和外语这些副课上偷偷抄，但是不能在桌面上抄，只能把课本竖起来，假装抄笔记。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因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文革”色彩非常浓厚，我们课余时间主要也是挖防空洞，挖战壕，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逃课时就躲在防空洞里抄。防空洞里是黑的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出来后赶紧找水洗洗，怕老师家长追问呀。还有一个抄手抄本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小坟包，那里不像北方有一个个大坟场，他们的坟都零零星星地建在丘陵上，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抄的时候逞能——我胆大，不怕死人，特别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时候。记得有个《神秘的教堂》，中间有两个人物张大胆与张心慌，故事是反特内容，这两个人物是不是他们抄时自己加进去的还很难说，但情景与当时情况比较相似，因为四川的坟头部要种一棵泡桐树，它的叶子大，有时能躲个雨什么的。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份，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

问：你见到过因传抄手抄本被处理过的没有？

答：没有，只听说过不少因看《少女之心》犯罪被判刑的，老师没收到手抄本后也不太深究，他们也没什么东西看呀。后来，也就是78年“科学的春天”发表以后，这些手抄本就没市场了，当时四川有几个文学刊物就开始登手抄本的内容，但不叫原名了。这些故事传抄的过程中变化都比较大，比如像《零度病人》，《绿色尸体》和《奇怪女人粉红色的脚》等。这个《零度病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人还有零度的体温，故事讲一个病人送进医院，检查体温是零度，护士报告公安，后来由此侦破敌特的故事。我们传抄时都很隐密，也不写传的时间，怕人知道呀。我第一个见到的手抄本是《炸毁重庆市公安局》，比较接近《一只绣花鞋》的故事，传抄的过程中都在往里加东西。谁传给我的记不清楚了，要能想起来没准还能找出几个本子。

问：《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这些手抄本您当时见过没有？

答：我记得《少女之心》是黄色的，学校检查得很严。当时学校还比较封建，男女生之间不说

话,《少女之心》在高中生和大人之间抄的利害,我们不敢抄,那环境的压力太大了,同学要知道谁看过这些东西,都不会和你说话。

问:你能找到的手抄本有多少?

答:我现在能找到的有两个,一个是《金三角》,另一个是《远东之花》。

问:您在这么多年中搬家或碰上政治运动时想没想过把这些东西毁掉?

答:实际上肯定销毁了不少,而这两本也是无意间保存下来的。我父母胆都特别小,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从北京带去的细瓷碗,都用破布包了用小锤子敲成碎碴扔了,我母亲的高跟鞋也都自己在家把跟弄掉。当时我母亲留着长辫子,兴这个呀,但也得较了,我母亲哭得泪人似的。我受父亲的影响,自己收集烟签和糖纸,这些东西夹带其中,庆幸留下了这两本,这还是回到四川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再打听我当时的同学,都说没了。

问:您觉得手抄本对您后来有什么影响?

答:对我的语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作文和日记的写法等,思想方面比如对邪不压正等观念的树立都有好处,积极意义还是多一些。

◇ 一万元买一个故事——为我们一代人的阅读史结账

访谈对象:白先生

访谈人:周勃

访谈时间:2001年3月26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某小区内

基本情况:满人在旗,16岁初中毕业去山西插队,后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又往昆明农科院学习,1974年困退返京,后在工厂、机关工作。1998年偶然机缘涉足图书策划业,策划过不少有影响有品味的图书,《一只绣花鞋》是其引爆媒体喧嚣的又一成功个案。

问:作为一个成功策划过不少畅销书的策划者,且此前策划的《一只绣花鞋》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市场效应该获得了较大的回报,之后又策划这本《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现在看来有可能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从市场角度来讲,也有一定风险,更何况有违“见好就收”的古训。您是如何想的?

答:我这个人生性平和,穷也这样,富也这样,把得失什么的都看的比较淡。手抄本这东西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没什么太深的感觉,往后收集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其重要且有意思,简而言之,那是我们一代人、特别是处于那个时代社会最底层的青年人的精神填充物,是影响我们这代人心理成长,甚或一生的读物,这并非什么大话套话,现在不是流行什么“谁点歌,谁买单”么?无论是从当年是一个插过8年队的知青,还是今天的策划人身份,我碰不上就不说,若碰上了能搭把手就尽量搭把手,人嘛。

问:您如何能想到开掘“手抄本”的?

答:这还要从与张宝瑞接触说起。我无意中看到了张宝瑞写的《梅花党》,我一见觉得这书当年好多人想看而看不到,我就把书稿拿过来,又将《梅花党》改成《一只绣花鞋》,我当时编这本书的时候就想把这些东西系统地编下去……(叙述况先生的《一双绣花鞋》与张宝瑞之间的纷争,以及自己亲赴重庆的经过)。我对这些手抄本的收集,是从《北京青年报》开始登的第一篇有关手抄本的文章开始的,记者用张宝瑞的口吻写了篇《我想多找几只绣花鞋》,便有不少读者打电话提供线索,我又从报社提供的信息中去找相关的人。我收集这二十几个本子也挺不容易的,其间眼看着谈成了又变卦,有人短短一个故事一开价就是15万元,就薄薄的那几页纸呀!我去首都图书馆咨询,他们说国家按有关规定要收集这些东西的话,一张纸才值几元钱!我就开始独立收集,最多的一个故事付过一万元。当然也有碰到非常热心的好人,其中一位姓田的

先生亲手交给我许多手抄本原件的时候，一句讲条件的话都未提过，我记得老人只讲了一句“你们拿去做研究吧，我能做点贡献又算得了什么”。收集当中有许多原件已经破旧，有些被老鼠咬过，我拿回来用胶水小心粘好。其实我做这项工作，是想对“手抄本”这一“文革”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作以系统梳理，也算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史结账吧。

问：能不能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手抄本”的版权？

答：作为策划人，我与出版社都一直非常注意版权问题，从我进入这一行业便是如此做的，因为原创者是这一行业的重中之重。比如重庆况先生和张宝瑞先生的争论与我并无关系，与我编的这本书也没关系，他们之间仅是为了《一只绣花鞋》这本书序言中的一句关于电影《雾都茫茫》取材出处，但我仍于得到消息的当日乘飞机去重庆倾听了况先生的意见。所以我与出版社都同样非常希望本书中所收录的这些手抄本的原创作者能站出来，这对完善手抄本是一件好事，当然应会在足以证明其原创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他们，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问：能不能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经历？

答：我是1966年11月份离开北京的，那是被迫的，就像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诗中描写的那样，火车汽笛一响，整个车站“哇”地哭成一片，因而我看了那首诗就很有共鸣感。当年走的时候确实是那样，老的送小的，小的送同辈的，整个站台上哭声一片，有的火车开了仍拉着手不松开。那些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说知道这批知青明天或后天要走了，学校里或者街道办事处事先安排人准备锣鼓家伙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搞这些个东西，其实，那实际上跟现实是两码事儿。

问：您插队去的是什么地方？请谈谈刚到那里时的经历。

答：我1966年11月份去的山西雁北地区，那里是兵团，农村比兵团还苦，在那儿一过就是3年，后来组建内蒙兵团，从山西抽调了一部分人支援内蒙，我就随队到了内蒙。就又过了5年，我还算是享福的，基本上没种过地，放过羊，赶过马车，那阵能赶上马车也算很不错的了，那是技术活儿呀。在内蒙期间因工作需要，被派到昆明的云南省农科院学习了大概有3年。在内蒙相对能好一些，吃饭和部队一样，大伙围一圈吃，干农活儿时累点儿，但比在农村插队要强些。

问：有什么娱乐活动？在农场里看些什么书？

答：什么书也没有，除了“毛选”。电影差不多一个星期能看一次，放映队一来，在空地上挂一块银幕，正反两方面都能看见，内容特别单调，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部电影。

问：手抄本那会儿看过没有？

答：让我想想，在云南时看过这些东西，别看在内蒙待的时间长，可是没看过这种东西，那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环境，根本不允许有私人空间，你想单独干什么，不可能，班长盯着你，都是集体活动。在云南看过一些，可也记不得是什么东西了。过后我感觉手抄本是从六八年底由那些年龄较大且能写的人开始写，写的过程一直到了七三年初，但没有太流传开，后来各种大运动尘埃落定，书店里也没什么东西可看，这些东西就流传开来。

问：请谈一下你后来是如何开始搞图书策划的？

答：我七四年困退回的北京，还比较顺，刚回北京也见过这些手抄本，我一个朋友爱弄这些东西，还写过手抄本。我一直在工厂后在机关里工作，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来做图书策划这一行，也许是一种喜好的缘故吧。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本书的收集、编辑是众多朋友相互的支持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对那些不愿留下姓名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亦为今后的出版编创提供信息。

~~~~~

## 【拒绝遗忘】

人民日报老记者穿越文革禁区

• 叶小蓁 •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中共宣传部禁止纪念，但老革命、老记者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却上了柜。全书六十六万字，首印四万五千册。可见这部书是从禁制令下钻出去的“漏网之鱼”。

从本书装帧设计上也可看出出版者的良苦用心：从书名到副题《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虽然“文革”二字完全回避，但作为封面人物的红卫兵及大红封面，却又是文革的典型标志。

该书讲述的文革史，“红色恐怖”四字可以全部概括。书中写道，红色恐怖并非始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而是此前两月的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学生批判教授由口诛笔伐演改为肉体折磨，并且得到毛泽东与江青的肯定，“这是革命行动”。历史将牢记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学生由“首善”堕落为“首恶”的重要一日。

大搞恐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剥夺人们思想的自由，并由此建立现代迷信。唯有恐怖可以令知识渊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至自我诽谤、自暴自弃。可是，恐怖也是双面刃，令全面操控文革的毛泽东、林彪及江青也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兵变”、“政变”与“暗杀”的被迫害幻想之中。

精神上有巨大压力，人岂能会有正常思考？所以，中共第九次全国党代会之后，毛泽东、林彪风声鹤唳，认定苏联即将突然袭击中国，宣布全国一级战备。“战争前夜”俨然来临，林彪竟下令北京周围水库“泻洪”，幸亏被周恩来及时阻止，否则将重演抗战时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炸毁花园口黄河堤坝、生灵涂炭的惨剧。

书中提及冒死抗议文革的勇者。张志新受审时痛斥法西斯主义刑讯暴行，大义凛然宣告自己的政治观点，“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并反问审讯者：“我没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被审者变成了代表真理与正义的审者。

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都举了手，参与了对刘少奇的迫害，其实也严重地羞辱了自己，唯有老革命陈少敏蔑视地双手抱肩，显示崇高气节。

中共书法家舒同在迫害中奋笔撰写“申诉长卷”，直指文革当局“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秦桧只知道‘莫须有’三个字，而你们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陷害，而且陷害的时间是这样长……程度是这样的深，彻头彻尾！”

如果说舒同的激烈言辞透出与“党”决裂之意，那么自杀未遂、被截断两腿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在病房受审时，把夜壶掷向专案组“奸徒”，则是抗暴的义举了。

牵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野蛮”势力竟是如此强大，就是在文革结束后仍然故我。毛泽东以“民主革命”为旗帜，唤醒民心，却开端了又一个“万岁”声不绝于耳的封建王朝。而文

革中吃尽毛泽东个人迷信苦头的邓小平，曾入木三分批判了毛泽东传位林彪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但当邓小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不仅如法炮制为自己指定接班人，而且在程度上比毛泽东还要过份，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

□ 原载《亚洲周刊》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